

丰碑

贵州省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丰碑

——贵州省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

贵州省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秘书处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良君

封面设计 石俊生

丰 碑

贵州省纪念遵义会议五十

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

贵州省纪念遵义会议五十

周年学术讨论会秘书处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二厂排版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60千字 6插页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书号3115·458 定价 平装本：2.85元
精装本：4.05元



贵州省纪念遵义会议召开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在革命历史名城遵义举行。图为讨论会会场。

李仁义 摄

紀念遵義會議五十周年
發揚理論聯系實際傳統

伍修權 一九八五年
元月十日

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伍修權同志
為學術討論會題字。

加強黨史研究
發揚遵義會議
精神！

童小鹏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日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副
主任、全國政協常委童小鵬為學術討
論會題字。



▲ 专程来贵州参加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伍修权、童小鹏同志出席了学术讨论会，并在会上讲话。图为伍修权同志在讲话。

◀ 在学术讨论会期间，伍修权同志与中共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右）、贵州省军区顾问薛光（中）亲切交谈。

► 学术讨论会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教员冯建辉（左），就遵义会议有关历史事实向伍修权、童小鹏同志请教。



隆重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



出席贵州省纪念遵义会议召开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合影。

(以上照片除署名者外均为王正雄摄)

目 录

在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杨尚昆 (1)
纪念遵义会议, 怀念闻天同志	伍修权 (6)
实事求是 振兴贵州	朱厚泽 (11)
遵义会议前后	罗 明 (17)
历史经验的启示	常 征 (33)
伟大的历史转折	马齐彬 王荣先 (45)
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转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结果	刘经宇 (93)
张闻天与遵义会议	张培森 (102)
遵义会议给我们的启示	杨一鸣 郭文运 (113)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 教条主义思想路线的失败	黄国定 (125)
遵义会议的独立自主思想永放光芒	王棣章 (133)
历史的丰碑	谢本书 (146)
论遵义会议	胡雄杰 (154)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的典范	郭德宏 (165)
先后媲美 交相辉映 ——试论遵义会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	谭宗级 (173)
遵义会议前后红军由被动到主动的历史转折	盛仁学 (180)
遵义会议为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 经验	杜绍忠 周建新 董维彬 (192)

对遵义会议成功原因的探讨	陆友山 (203)
四渡赤水作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	刘国语 (215)
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前后的杰出贡献	费侃如 (225)
独立自主, 走自己的路	项承武 (233)
中央红军争取创建川滇黔边区根据地的斗争 及战略方向的再转移	陈集忍 (245)
四渡赤水之战—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	梁正贵 (259)
试论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对遵义会议的 杰出贡献	黄自为 (270)
遵义会议和独立自主	胡庆寅 黄世稀 (279)
遵义会议是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典范	柯 惠 (285)
试论红军两战娄山关	顾大全 (296)
长征的胜利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	张 烈 林齐维 蒋南华 (306)
遵义会议是党走向成熟的标志	邵代富 方维刚 苏文竞 (316)
附录 [一] 贵州省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学术 讨论会在遵义举行	(321)
附录 [二] 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324)
附录 [三] 贵州省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学术讨论 会论文目录	(329)
后 记	(334)

在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①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七日)

杨 尚 昆

同志们：

今天是遵义会议五十周年。我们许多参加长征、直接或间接经历遵义会议的老同志，一些担负领导工作的较年轻的同志，大家欢聚一堂，一起来纪念这个光辉的日子，心情都很激动。耀邦同志让我在这个会上讲几句话，我作为一个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很高兴同大家一起谈谈自己的心情和感想。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党和军队经历过许多伟大的斗争，既经历过无数激动人心的巨大胜利，也经历过不少令人痛心的严重挫折。我们党的伟大，就在于每次严重挫折，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转危为安，以更加旺盛的战斗力，按照正确的方向，继续不畏险阻地向前迈进。从我们党的历史看，经历过三次伟大的转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建立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是第一个伟大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第二个伟大的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第三个伟大的转折点。当年参加遵义会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刘伯承同志，聂荣臻同志，以及其他的有关同志，许多参加长征的老同志，都对这次伟大的转折保留着极为深刻的印象，并且以这次伟大转折的丰富经验指导着今天的伟大转折。

同志们知道，一九三一年一月，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

^①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八日。

主义、宗派主义者，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开始了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对党的统治。一九三二年初，“左”倾冒险主义的推行者，在当时的中央根据地改变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路线，实行一条完全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他们主张以阵地战来反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同敌人拚消耗。同时，在反对右倾的借口下，“改造”了执行正确路线的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到一九三三年底，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取得了完全的统治。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使“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了顶点：在军事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是进一步发展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无情打击的政策。

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主持人，不顾中国革命实践的种种错误作法，不仅无法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而且使红军力量大为削弱，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被迫撤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在长征途中，由于遇到敌人的围追堵截，在抢渡湘江后，中央红军的主力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并且无法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提出避开敌军主力，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采纳了这个正确方针，红军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上旬占领遵义后，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集中力量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正如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

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遵义会议的更深远意义，还在于使我们的党，首先是实行正确路线的核心领导人员，开始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必须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走自己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后不久，即着手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探索多次遭受失败的教训，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不朽的著作。毛泽东同志在这些著作中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实事求是。为了切实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着重组织了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哲学，要求大家首先学懂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我们共产党人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学懂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如果不弄清中国的实际状况，不从实际出发，而只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原理，引用它的片言只语，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那不仅对革命没有用处，而且会给革命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葬送革命。我们党领导的无数次斗争，都证明了这一点。

正如大家熟悉的，从一九四二年开始，我们党开始了整风运动，即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法，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从党内指导思想上来解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经过整风运动，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思想就成为全党的旗帜，成为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指南。从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开始，经过十年多的时间，比较完善地深入地解决了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我们党的力量就成百倍地壮大起来，在各种斗争中战无不胜。

经验证明，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思想路线端正与否，是革命和建设成败的关键。在座的各位都清楚，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使我们的党和国家从危难中得以新生。但是由于“两个凡是”和极左理论的干扰，使我们党和国家步履艰难地徘徊了两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实际主持下，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这次会议，使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次会议如同遵义会议一样作为一个伟大的里程碑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的六年中，我们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党在新时期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深入人心。归根到底，这是我们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确立的思想路线的结果。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同时又抛弃了原来那些实践已经证明不适合中国具体实际思想和僵化模式，在振兴国内经济、发展对外关系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上都创造性地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实行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方针、政策，使农村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进展，以城市为中心

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第一期整党工作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圆满地解决了香港问题。总之，在各条战线都取得了令人兴奋的好成绩，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对于这一事实，邓小平同志概括地指出：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他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我们党成立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年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水平空前提高。我们既有成千上万经过几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又有数以百万计的朝气蓬勃、知识丰富、年轻有为的新同志。更重要的是我们党还有一个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掌握正确路线的、坚强的中央领导核心。我们的事业方兴未艾，前途光明灿烂。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对未来充满信心。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还很艰巨，大量新事物、新知识需要我们重新认识，重新学习。我们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就是要牢牢记住“左”的路线给我们党带来的血的教训，就是要提醒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严格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同志们，我作为遵义会议的参加者纪念遵义会议，感想是很多的。我深深感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一个真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在这个真理的指引之下，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新的伟大的胜利。

纪念遵义会议，怀念闻天同志

伍 修 权

遵义会议距今已经有半个世纪。在纪念遵义会议的日子里，我深切地怀念着我的兄长、尊师和战友张闻天同志。

我青年时代参加进步活动，看一些进步书刊，就从《小说月报》、《东方杂志》上看到闻天同志写的文章，给我留下了初步的印象。

一九二五年十月下旬，我有幸和他一同乘船经海参崴转乘火车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海船上见面时，他已是二十五岁的成年人，拿中国的成语说，正是三十而立、风华正茂之时。从他的性格来说，已是定型了。他是那样温文尔雅，带着一副度数不深的近视眼镜，身材高大，态度安静，有一种大学教授的风度。

到达学校以后，闻天同志和其他一些英文底子较好的同志编到英文班，直接听教授用英语教课，这是他们在学习上很大的优越性。原来学生都住在学校的大楼内，后来学员不断增多，有从广州来的，有从欧洲法国、比利时、德国来的，这样只得分住到校外的宿舍去。有幸我们又住在一个宿舍，但不在同一房间。学校里的一天活动完全结束以后，大家都回到宿舍。象我这样的人，回宿舍后闲聊一阵子，时间就过去了，睡觉大吉了。闻天和另一些同志则不然，他们还在自学的走廊上学习到深夜才就寝。他们这样好学的精神，当时虽然对我有所触动，但我终未能向他们好好学习。

时间过得真快，从一九二五年底倏忽到了一九二七年九月。这段时间我和闻天同志在一个学校学习，虽不同班，但朝夕相见，有时也聊聊天，尽管谈得不深，彼此还是很熟悉的。在同一时间内，国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北伐军的胜利，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的政变，由宁汉对立到一九二七年七月汪精卫背叛和宁汉合流，使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我们这些在莫斯科学习的同志，本来是想学些革命理论后回国参加革命工作的。由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除少部分同志取得了回国参加工作的机会外，多数同志不得不滞留在莫斯科。中共中央通知驻莫斯科的中央代表，安排滞留在莫斯科的同志到各方面学习。我这时进入莫斯科步兵学校。据说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三人，经过考试，进入了苏联最高学府——红色教授学院。这样，我们在几年之内没有接触，没有见面。一九三一年六月，我由苏联回到上海。在同党组织取得联系后，中央交通经常将当时中央的刊物《红旗周报》给我们看。闻天同志早于我们在一九三一年初回到上海，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斗争，参加了中央机关的领导工作。在中央的刊物上，他主要是用“思美”的化名发表文章的。我们在苏联学习时都有个俄文的姓氏，闻天同志用的是ИСМАИЛОВ，思美就是这个俄文姓的中间一个音节。后来他又长期使用“洛甫”这个化名，这是他的俄文姓的后一个音节。

一九三一年七月，我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当年年底调到瑞金红军学校工作。一九三三年春，闻天同志等也到达瑞金。我是作基层工作的，他则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虽然相隔的层次很多，但我们相见以后，交谈还是很融洽的，他没有架子。

一九三三年十月，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瑞金，我被调去当翻译。这样，我同闻天同志的接触就多了。

一九三四年，中央苏区处于严重的战争环境，闻天同志对于

战争的发展是很关注的。他不直接参加军事指挥。但是，他当时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军事情况的材料都抄给他，他还参加军委的会议。因此，他了解反“围剿”的情况。他早就觉得李德不大对头。但开始还不十分注意，到广昌战役就不同了。广昌战役是一次关键性的战役。李德、博古亲临前线视察，人们希望很大，以为可以打一个胜仗，凯旋而归，结果打了败仗。敌人来势汹汹，我们支持不住，只好退了下来。

博古等人回到瑞金后，开了一次军委会。闻天同志在会上同博古同志争得面红耳赤，说这是一种拚消耗的打法。会议休息时，他同我个别谈话。他说这种打法不可能取得胜利，问我怎么看。我也同意他的看法，我深深地体会到他是很注意这个问题的。他在会上发表了意见，会下也说了意见，态度是很明朗的。

闻天同志同博古的争论，自然涉及李德问题。闻天同志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我们自己要有点主意。他对于博古过于重用李德是不满意的，认为这样下去打破五次“围剿”没有希望。博古则认为执行李德的军事指挥还是正确的。

那次发生争论的会议，李德也在场。李德后来还经过博古向闻天同志转达了意见。说：你们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国的事情还是要由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你们之间应该消除前嫌，消除彼此之间的不了解，应该很好地合作。但是据我所知，在这次争论以后，闻天同志的态度没有改变，一直对当时的军事指挥采取怀疑的态度。

那次发生争论的会议，毛主席没有参加。李德到苏区后的第一次会议，毛主席是参加的，我在场当翻译。李德当时非常狂妄，他的口号是：游击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再不能打游击战，应该打正规战。毛主席处于当时的地位不愿起来驳斥，觉得这根本不对头，不可能取得一致。在这以后，毛主席就拒绝参加会议，因为同李德没有合作的可能。当时经常参加军委会会议